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4.03.014

骑士型种植园主、文化适应与印第安性 ——论《奇瓦部族的酋长》之跨种族共同体建构书写

易捷心, 沈阳

(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 在 19 世纪中期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推行文明开化与强制同化的政策背景下, 威廉·吉尔摩·西姆斯在其历史罗曼司作品《奇瓦部族的酋长》中对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跨种族的共同体构建进行了讽喻式书写。就共同体的领导者而言, 西姆斯融合了美国当时诸多流行的男性气概范式, 塑造出具有骑士精神的白人贵族精英形象作为理想的种植园主阶层载体; 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文化适应, 作为对 19 世纪中期美国对印第安人强制性教化的反动, 被当作共同体建构的主要手段; 通过印第安人对自身文化传统坚守的呈现, 西姆斯深入思考了如何利用印第安性来丰富跨种族共同体的身份构建问题。

关键词: 《奇瓦部族的酋长》; 跨种族共同体; 骑士型种植园主; 文化适应; 印第安性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4)03-0117-08

Planter-Cavalier, Acculturation and Indianness: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racial Community in *The Cassique of Kiawah*

YI Jiexin, SHEN Ya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cultural assimilation and enforced civilization of the Native Americans by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in the mid-19th century, William Gilmore Simms has written allegoricall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multiracial community between the white men and the Native Americans in his historical romance *The Cassique of Kiawah*. As for the leader of the community, Simms has integrated many then prevailing paradigms of manhood in America and portrayed the chivalric white patrician elite as an embodiment of the planter ideal. The mutual acculturation between the white men and the Native Americans, as a counteract of the enforced cultivation of the Native American people by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in the mid-19th century, is a major means of forging the community. By representing the Native American's adherence to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of themselves, Simms has probed into how to make use of Indianness to enrich the identific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interracial community that he has envisioned.

Keywords: *The Cassique of Kiawah*; interracial community; planter-cavalier; acculturation; Indianness

收稿日期: 2023-12-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姆斯罗曼司中的共同体思想研究”(22BWW037); 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西姆斯对美国内战前社会发展的反思研究”(22A0388)

作者简介: 易捷心, 男, 湖南株洲人, 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美国思想史与美国文学; 沈阳, 女, 贵州铜仁人, 湖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文学。

作为爱伦·坡眼中美国19世纪最好的小说家和政治理论家,威廉·吉尔摩·西姆斯(William Gilmore Simms, 1806—1870)在其作品中表达了丰富而独特的共同体思想。西姆斯被学界普遍视为美国南方文学之父,当时的一位评论家指出,“在美国文人的万神殿中,西姆斯必然有其高贵而荣耀的一席之地,这样的评价是公正而开明的”,“只有时间才能使他的声誉得以圆满”^[1]。同时,西姆斯也是美国历史上最热心政治的作家之一,其对于政治的高度介入,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其殖民地三部曲中最后一部作品《奇瓦部族的酋长》(*The Cassique of Kiawah*)创作于1859年,当时正值美国南北战争前夕。此时,南方与北方就奴隶制存废的争论进入白热化的阶段,美国政府针对印第安人的政策也开始由文明开化转向强制同化。

从殖民地时期到19世纪中期,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占绝大多数,虽然仍有大量白人源源不断地从欧洲各地涌入美国,但他们都无法撼动前者的统治地位。在这段时间里,随着欧洲移民促使美国主流的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文化向白人民族文化转变,到19世纪中期以后,“美国种族主义逐渐形成,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的思想逐渐扩大到来自欧洲的所有白种移民”,于是,“在WASP文化主流地位丧失后,美国人的民族认同观发生了第一次改变:他们开始强调‘欧洲美国人(European Americans)’而不是‘盎格鲁-撒克逊美国人’(Anglo-Saxon Americans)”^[2]。就非白人种族而言,黑人虽然在整体人口中的占比不低,但由于受到严重的种族歧视,其基本上处于被奴役状态。对于印第安人,除贵格派和少数传教士外,白人总体上也采取蔑视与敌对的态度。

自美国建国以来,印第安人虽然在事实层面上被排斥在美利坚民族之外,但美国政府一直试图采取各种措施来推进其整体的美国化和公民化进程,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文明开化政策和强制同化政策。二者都是以向印第安人灌输白人文化为主要内容,有所不同的是前者给予印第安人一定的自由选择权,即他们可以自主选择接受或不接受白人的文化同化,后者则完全剥夺了这种

选择权,强迫印第安人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并改宗白人文化。在这种背景之下,西姆斯在《奇瓦部族的酋长》中针对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跨种族的共同体构建进行了大胆的构想。在这个共同体中,西姆斯主张以具有骑士精神和男性气概的白人贵族精英作为领导阶层,这种白人贵族精英形象实际上就是他设想的美国南方社会中理想的种植园主形象。凭借对白人和印第安人角色之间文化适应的书写,西姆斯表达了自己对美国政府强制同化教育印第安人政策的批判态度,也展示出其共同体构建的主要策略。同时,他也以同时代白人罕见的对印第安性的深刻洞察,以对印第安人坚守自身文化传统的文学呈现,彰显了其对共同体身份构建的独特作用。

一、作为共同体领导者的骑士型种植园主

《奇瓦部族的酋长》中有两位白人男主人公,分别是爱德华和哈里,两人是兄弟,分别主导作品中两条主要的情节线。该作以1684年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爆发的奇瓦族印第安人与英国殖民者之间的奇瓦之战(The Battle of Kiawah)为历史背景。围绕这一事件,英国男爵爱德华试图通过对印第安人酋长之子伊斯瓦提(Iswattee)进行文明教化来缓和与改善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哈里原本是英国政府所批准的战时海盗,作为英国海军的辅助力量与西班牙海军作战。只因被英王查尔斯二世作为政治权谋的牺牲品出卖,哈里一夜之间变成了海盗,成为英国人追捕的目标。此后,哈里就背负着海盗的恶名继续在查尔斯顿暗中活动,包括继续帮助英国人打击西班牙海军。同时,两人的活动轨迹也发生了交集,出于对印第安人的不信任,哈里多次劝说爱德华放弃文明教化印第安人的计划,并提醒他要防备印第安人突袭殖民地,但爱德华仍然坚持己见。最终,正是在哈里的精心谋划和准备之下,殖民地人民才得以在印第安人的偷袭行动中获得胜利。

凯文·科林斯(Kevin Collins)认为,西姆斯在刻画这对兄弟时,采取了一种“双重化”(doubling)的策略,即“让两个人物担当同一个角色”^{[3]10-11}。笔者认为,这对兄弟其实是一个“双生”人物(doppelganger),二者既有矛盾性的属性,也有互补之处。这种手法,不仅可以颠覆传

统罗曼司中恶棍与英雄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 使人物善恶属性呈现出复杂的面相, 更可以其饱满的性格特征和个人品质成为作者传递共同体构想的有效载体。爱德华是长子, 享有财产继承权, 但他没有留在英国坐享家族财富, 而是前往北美, 作为那里“新近崛起的卡罗来纳贵族”, 建造自己的男爵领地。他具有边疆拓荒者那种开拓进取、踏实肯干、吃苦耐劳的精神, 虽贵为男爵, 却凡事亲力亲为。他拥有令人惊叹的工作技巧, 丝毫不像一个养尊处优的英国贵族。“他抓起斧头和锤子, 以工人般的双手操持这些工具, 并且令他们困惑和惊讶的是, 作为绅士, 他同时拥有规划和执行的能力, 而且他展示出来的技巧和力量, 在我们看来, 对于绅士而言本应该是不适合和反常的。”^{[4]221} 书中对于爱德华工作的场景有多处描写。他不靠自己的贵族头衔和身份地位, 单单以自己的实干精神在新大陆从无到有建立起自己的产业, 这一点与西姆斯另一部作品《亚马西人》中的白人主人公克雷文爵士非常相似。克雷文一直以哈里森上校的化名在殖民地勤恳工作、精心筹划, 带领白人抵抗印第安人的袭击。直到临近故事的结尾, 他才向众人宣告自己的贵族身份。爱德华和克雷文可以称得上是“自然型贵族”^{[5]141}, 他们是天生的领袖, 以自己的领导才能和务实精神而不是贵族身份统领众人。

相比之下, 作为次子, 哈里无法继承家族财产, 更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获取财富、声望和社会地位。他从事的是一项特殊职业——欧洲历史上曾经风靡一时的战时海盗。战时海盗视为被官府招安的海盗, 作为国家海军力量的补充, 在战争期间为国效力, 其身份性质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海盗本以袭击商船获取对方财富为目的, 而战时海盗的攻击对象则既包括敌方的商船也包括军用船只, 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削弱对方的军力。就哈里而言, 他主要是出于爱国情感去担当这个褒贬难辨的角色的。哈里的爱国主义在他被英王唾弃以后体现得更为明显。在查尔斯顿, 他一边要躲避英国殖民地政府对他的追捕, 一边却又时刻关注着英国海军与西班牙人之间的战况。当英国人在一次海战中受到西班牙人的偷袭时, 他立刻施以援手, 击沉了后者的战船。但哈里的爱国并不是盲目的, 当总督夸里劝他忍受海盗的恶名

继续为英国暗中袭击西班牙人时, 哈里拒绝了这个要求, 他回答道: “我曾与法国人和西班牙人战斗, 也会继续与他们战斗下去, 直到世界的末了……但只会在我的国家为我的行为鼓掌喝彩的时候。”^{[4]117} 这表明哈里十分看重自己的名誉。按照 17 世纪英国社会的爱国主义观念, 如果国王本身道德败坏, 那么反对他就意味着爱国^[6]。哈里后来出尔反尔, 但仍然为英国人效力, 这说明在国家大局和个人荣辱之间, 他还是选择了前者。同时, 他在与西班牙人战斗的时候, 特意挂起了英国的国旗而不是自己以前使用的海盗旗。这个举动也将他的荣誉感和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哈里远非光明正大的英雄人物, 他早年的确靠海盗活动掠夺了不少财富, 甚至带到查尔斯顿进行走私交易, 大获其利。他称得上是一个自力更生白手起家的人物, 但显然不是典型的富兰克林式的自造之才。

作为西姆斯颠覆传统的贵族和自造之才范式的人物形象, 爱德华和哈里在对待印第安人的问题上, 也略有不同。爱德华主张对印第安人采取“和平和人道的政策”^{[4]125}, 他收养酋长之子伊斯瓦提, 并向伊斯瓦提灌输白人文明, 就是这一政策的具体实践。哈里虽然赞同爱德华的计划, 但他认为, 向印第安人传播文明是需要思考的难题, 因为既要保证“该族人享受高等文明社会的福祉, 又不至于危害和减损其基本的男性气概”^{[4]598}。所以, 他对印第安人仍保持着戒备之心。哈里的审慎与爱德华的盲目自信形成了鲜明对比。

如梅菲尔德 (John Mayfield) 所言, 西姆斯在其罗曼司中刻画的“主要的男性主人公都体现出所谓贵族型男性气概范式所包含的品质”, 这种范式基于“少数精英的意识形态, 也就是商人、绅士、大地主和律师, 用古英语或者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说, 就是上层资产阶级”^[7]。就美国战前南方而言, 这个男性气概范式仅限于南方种植园精英。正如曼斯菲尔德所指出的, “男性气概不是某种所有男人都具有的性质, 而是少数男性以一种高级的方式具有的品质”^[8]。可以说, 种植园精英所代表的贵族型男性气概就是美国战前南方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在《奇瓦部族的酋长》这部罗曼司中, 西姆斯显然也赋予了其白人主人公这样的男性气概, 并且以之指涉种植园精

英,但跟以往作品不同的是,西姆斯塑造了两个看似对立的并且是非典型的人物形象来实现这种指涉。爱德华具有贵族的头衔,但他的所作所为又丝毫没有贵族的派头。哈里靠自力更生发迹,不失为一个爱国的英雄,但他致富的途径却极不光彩。西姆斯也结合了维多利亚时代美国社会其他流行的男性气概范式来丰富爱德华和哈里的人物形象。比如共和型男性气概(republican model of manhood)推崇“个人主义,独立,自治,以理性的名义抗拒专制权威”,而自力更生型男性气概(self-made manhood)则“看重进取心,自信,竞争意识,利欲,以及理性,审慎,节俭,节制,努力工作和自主的行为判断”^[9]。这些男性气概在爱德华和哈里身上都有所体现,二者的优缺点相互对立又互为补充。可以说,二者的形象极大地超越了肯尼迪(John Pendleton Kennedy)在其种植园小说开山之作《燕子马厩》中(Swallow Barn, 1832)树立的骑士型种植园主(planter-cavalier)的典型形象。该作中,主人公弗兰克作为骑士型种植园主的核心特征是“举止优雅,充满慈爱之心”。作为“拥有大量土地的绅士”,他“生活接近大自然”,且热情好客,对待自己的奴隶“亲切而宽容”^[10]。显然,爱德华和哈里构成的双生角色展现出了远比弗兰克丰富的男性气概。

其实,结合西姆斯的社会秩序观和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我们就能更深入地理解何以作家要在《奇瓦部族的酋长》中塑造出这样的种植园主形象。作为美国南方作家,西姆斯对南方社会保持着高度关切。他理想中的南方共同体建基于奴隶制以及以种植园经济为核心的重农主义和骑士美德之上。需要澄清的是,对于西姆斯而言,奴隶制是在美国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之外的另一种社会理念,它建立在奴隶主的美德和对奴隶劳动力的保护的基础之上,其也代表了当时美国资产阶级对于人性的怀疑立场。虽然在世人看来,奴隶制以剥削为主要特征的牟利方式和哈里所曾从事的海盗活动一样,是不光彩的,西姆斯也的确有意将二者进行类比^{[3]148-161},但是,在当时的南方统治阶级眼中,奴隶制并不完全是罪恶的。当时的西姆斯们认同奴隶制,并不意味着他们视蓄奴与奴隶的从属地位为正确的道德或政治选择,事实上,他们也只是把它看作是一种

渐进地完善奴隶品行的权宜之计。按西姆斯在《美国的奴隶制》(Slavery in America, 1838)中的构想,随着奴隶道德与智力水准的提高,奴隶制最终会消失,社会也就会随之进步^[11]。在这样一个等级制的父权社会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就是其领导者,而这个角色非骑士型种植园主莫属。与美国北方的工业资本家相比,仁慈善良的种植园主绝不会随意解雇工人(这种行为是西姆斯极为痛恨的),相反,他们会力求保障奴隶的日常所需。即使在种植园收益不佳的时候,也不会弃奴隶于不顾,这也意味着他们不会像资本家那样金钱至上、唯利是图。《奇瓦部族的酋长》中,爱德华和哈里身上显然就寄托了作者这样的政治理想。西姆斯本人也身体力行地践行了自己的理想。他对奴隶如此宽容,以至于后者常常不需要按时有规律地工作。其结果是西姆斯的种植园产量不足,他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文学收入来维持种植园的运营^{[5]120}。在西姆斯笔下,理想的种植园主形象兼具爱德华的仁慈、实干品质,以及哈里的荣誉感、爱国精神、审慎之心。

二、文化适应与共同体建构策略

从《奇瓦部族的酋长》中叙事进程的关键因素,也就是爱德华对酋长之子伊斯瓦提的文明教化当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窥见西姆斯设想的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跨种族共同体建构的主要手段。为了向伊斯瓦提灌输白人文化,爱德华得到酋长的许可,让伊斯瓦提住在他的家里,与他和家人一起生活。伊斯瓦提于是一方面为爱德华捕猎,一方面就与他的姨妹格蕾丝一起玩耍。两个孩子间的互动就成了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文化交流的缩影。在这个过程中,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对于格蕾丝与伊斯瓦提跨越种族障碍构建共同体起到了关键作用。这里的文化适应正是指“当具有不同文化的各群体进行持续而直接的接触后,双方或一方原有文化模式因之而发生的变迁”^{[12]161},但这种变迁并不意味着被教化者完全放弃原有的文化立场。在伊斯瓦提的影响下,格蕾丝掌握了印第安人野外生存和捕猎的技巧,“她变得像他一样野,他给她带来小鹿,还教她丛林中的技艺,比如如何用陷阱捕捉野兽和鸟”^{[4]516},而伊斯瓦提则从格蕾丝那里学会了英语。针对伊斯瓦提在学会这门

语言之后发生的变化, 西姆斯给予了戏剧性的描写: “每天, 如果说他在这门奇怪的语言中没有变得更聪明的话, 他的心却变得更柔软了, 他的情绪也变得更温和了, 于是, 他开始越来越感觉到, 他的父亲赋予他的职责是何等残忍。”^{[4]516} 这里需要解释的是, 虽然爱德华是出于善心收养伊斯瓦提, 让他接受白人的影响, 但伊斯瓦提的父亲却心怀叵测。酋长本人将自己的儿子当成了内线安插在爱德华的家中, 以便日后印第安人偷袭爱德华领地的时候可以里应外合。伊斯瓦提起先对自己的使命尽职尽责, 认真监视着爱德华家的一举一动, 但当他受到格蕾丝影响之后, 他的心却变软了。在之后印第安人发动袭击的前夕, 酋长如约前来寻找伊斯瓦提时, 却发现自己的儿子玩忽职守, 仍在睡梦当中。伊斯瓦提的失职, 对于奇瓦之战的结局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使得印第安人错失了战机。

在伊斯瓦提的形象塑造上, 西姆斯延续了其在《亚马西人》(*The Yemassee*, 1835) 中刻画的首长之子奥康内斯托加的形象范式, 这种形象威廉·泰勒(William Taylor)在其名著《骑士与扬基: 旧南方与美国国民品格》(*Cavalier and Yankee: The Old South and American National Character*) 中称之为“南方的哈姆雷特”(Southern Hamlet)。这种人物形象的典型特征是“明显缺乏活力和男性气质, 而这些品质正是南方男性气概传奇的基石”^[13]。有所不同的是, 奥康内斯托加丧失男性气概的罪魁祸首是白人使其染上了酗酒的恶习, 而伊斯瓦提则是由于学习了英语。西姆斯在这两部作品中赋予这两起白人针对印第安人的文化影响事件极为关键的地位, 使之成为决定印第安人战争成败和种族存续的强大叙事动力。但是, 如果将伊斯瓦提的悲剧仅仅解读成西姆斯对白人对印第安人文化侵蚀的控诉, 则忽视了其作为阈限人物(liminal figure)在两种文化之间游走的跨文化经历对二者的调解和中介的作用, 也就没有挖掘出西姆斯在此处传达的深层次寓意。实际上, 西姆斯是借用了感伤文学(sentimental literature)的传统塑造出逆子与严父的形象, 如艾莉森(Julie Ellison)在《凯托的眼泪: 英美文学中情感的塑造》(*Cato's Tears: the Making of Anglo-American Emotion*, 1999)中指出的, “含混的感伤对于后君

主时代的权力形式既可以起到合法化的作用, 又可以构成对其的批判”^{[14]58}。具体而言, 这种感伤通常以情感强烈的儿子与冷漠无情的父亲之间父子冲突的形式予以构建。如果儿子愿意忍受父亲的严苛, 感伤的语言就以法律的名义使严苛合理化, 而如果儿子抗拒父亲的暴力和冷酷或为之感到悲痛, 感伤则构成对于权力的挑战^{[14]58}。正是基于此, 西姆斯使得伊斯瓦提对父亲的抗拒带有消解其权威的倾向, 而父亲的权威在这个语境下恰恰构成了白人与印第安人冲突的根源。所以, 伊斯瓦提的感伤化作为其对白人文化产生文化适应的结果, 起到了使两种文明和解的效果。

应该注意到, 西姆斯对伊斯瓦提学习英语行为的刻画, 虽指向美国 19 世纪中期对印第安人尤其是青年人进行的强制同化教育, 即为了控制印第安人心智而发动的所谓“教室中的战争”^{[15]227}, 但二者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格蕾丝并没有强迫伊斯瓦提学习她的语言, 后者是完全自愿的, 而且, 伊斯瓦提自始至终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母语。这表明, 西姆斯没有让伊斯瓦提成为白人将印第安人及其文化传统完全剥离的去部落化做法(detribalization)的受害者的影射对象, 而是试图使伊斯瓦提在保全自身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接受白人的文化影响并产生文化适应。这正是西姆斯在《奇瓦部族的酋长》中针对白人与印第安人跨种族共同体建构提出的实际策略。这也并不是西姆斯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提出自己的共同体建构设想。早在 1841 年他创作的短篇小说《奥卡提布》(*Ookatibbe*)中, 他就提出了改造印第安人使其融入美国社会的方案。在这部作品中, 主人公哈里斯上校也做了跟爱德华类似的教化印第安人的实验, 他也相信印第安人可以在白人的影响下走向文明。哈里斯认为, 虽然印第安人非常顽固地坚持着自己以狩猎为主的生活方式, 但假以时日, “劳动的好处和祝福也会被这个种族中最无知与野蛮的人所感知和理解”^{[16]281}。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他们也会发现, 辛苦劳作不会削弱他们的力量, 也不会破坏他们的幸福, 相反, 他们的食物会像以前一样丰富而健康, 而且也可以避免狩猎所带来的食物供给不稳定并受季节变化影响的问题。他们也会意识到, 他们不但不会遭受造成大多数部落灭亡的饥荒之苦, 反而会获得大丰收。应该说,

这样的设想基于对印第安人文明充分的尊重和认可,而《奇瓦部族的酋长》也延续了这一设想。

值得一提的是,格蕾丝也在伊斯瓦提的影响下变得“印第安化”,她对印第安文明的文化适应也同样值得关注。对于格蕾丝习得的印第安人的狩猎技巧和森林知识,西姆斯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和褒奖。他认为这些训练正是塑造印第安人男性气概的关键,也是这个种族值得夸耀的资本,而在这方面,白人远不及印第安人。西姆斯的见解基于其一贯的文化相对主义的理念,即“强调客观地去对待其他文明……也反对民族主义与白人中心主义等思想”^[17]。同时,西姆斯对格蕾丝正面的“印第安化”的书写,也超前地表达出了其对印第安人文化之于美国社会巨大价值的认同。在19世纪中期,白人普遍视印第安人为低劣的民族。此一时期,无论是美国政府推行的文明开化政策还是强制同化政策,都是基于白人文明远比印第安文明优越的基本认知,而鲜有白人像西姆斯这样认识到印第安人作为一个独特民族的可取之处。西姆斯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明确提出,印第安人独特的民族性可以成为美国民族性有价值的组成部分。他指出,白人与印第安人的“联合如果最终达成,就像英国人那样,我们就将拥有一个种族,其后代在道德和身体结构方面,举世罕有其匹”^{[16]282}。西姆斯对于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异族通婚也持支持的态度。在他看来,这有利于双方互相学习、互补长短,从而促进跨种族共同体的构建。在《奇瓦部族的酋长》中,虽然没有有关异族通婚的书写,但是格蕾丝与伊斯瓦提之间纯真的友谊为彼此之间的文化沟通搭建了桥梁。从某种程度上说,西姆斯对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文化适应的书写也部分地呈现了人种史学家的美国历史观。根据这种史学观,“美国的历史不是文明战胜野蛮,而是欧洲人与印第安人的同化过程,在此过程中,双方的文化特征得以互换和传播,随后出现居于主导地位的欧洲人的社会和文化,以及潜伏于背后的印第安人的亚文化构成的一个大社会”^[18]。

三、印第安性与共同体身份构建

在伊斯瓦提接受白人文明教化的过程中,西姆斯也呈现出其作为两种文化之间的阈限人物所

面临的身份认同危机。同《亚马西人》中的奥康内斯托加一样,伊斯瓦提也夹在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无所适从。奥康内斯托加酒瘾发作之时,常常不能自己。一方面,他念念不忘自己酋长之子的身份,想要协助族人抵抗白人企图吞并家族土地的行为;另一方面,他又无法抗拒酒精的诱惑,沦为了美酒的奴隶,投入敌人的怀抱,并成为他们的走狗。伊斯瓦提同样也在自己部族赋予的任务与白人朋友的情谊之间进退两难。两人都受到异质文化的部分影响,但又未能做到完全认同它。这显然是在19世纪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推行同化政策之下很多印第安人的写照。在被迫接受美国主流文化的过程中,他们表现出部分的认同,但又无法完全适应。这样做的结果,并没能成功改造印第安人,反而破坏了他们的文化传统;同时,由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填补这种文化传承断裂造成的空洞,以至于“他们成了道德缺失的族群,迷失在他们自己历史的身份与他们无法接受的白人文化之间”^{[15]226}。

对于如何解决这个危机,奥康内斯托加与伊斯瓦提的做法有所不同。前者是以死来消解白人殖民者对其奴役与贬抑的殖民主义“他者化”(othering)企图,而后者则是坚守自身的文化传统,试图从中寻找出路。伊斯瓦提以印第安人独特的宗教信仰作为指引,服食带有麻醉和催吐效用的植物,等待印第安人伟大的“至上神”赐下“拯救与教导的启示”,哪怕他所获得的所有“洞见只不过给他带来感官的迷惑与错乱”^{[4]517-518}。

伊斯瓦提对自身文化的坚守也可以视为其对白人殖民主义的反抗,爱德华则流露出自己的殖民主义情结。爱德华声称,印第安人驯服野兽是“他的命运”,而且“他有一个作为先锋的使命,就是为优越的种族开拓荒野”,在爱德华眼中,这正是“上帝旨意的神秘之处”^{[4]514}。这番话反映了19世纪盛行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的思想,即相信上帝的旨意赋予美国在北美大陆开疆拓土,带领落后民族进入文明的使命。但爱德华也为伊斯瓦提与小鹿交流的能力所惊叹。伊斯瓦提“弯腰在小鹿的耳中低声说了些什么,同时,他抓住了它的前脚”,“接着,这只小动物就跳开了他,全速跑向草地”^{[4]513}。爱德华感叹道,“这真是这个种族才有的能力!宇宙中伟大的上帝为

每个地方的人们设计了他们的本性。野性就是野性, 它永远也不会被驯服”^{[4]513}。这种斯皮瓦克意义上的抗拒文明与进步且无法被驯化的他者异质性, 实质上构成了对爱德华殖民主义思想的消解。

更重要的是, 伊斯瓦提的文化传统所体现出的印第安性本身就代表着其对白人文明及其殖民主义的反抗。印第安人追求“简单的生活规则和简朴的生活方式”^[19], 且有自己对灵性独特的追求和对大自然的热爱, 因而未经现代文明污染。这种印第安性在历史上就曾经成为北美殖民地人民抵抗英国压迫的利器。美国历史悠久的“假扮印第安人”(playing Indian)的传统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比如, 在波士顿倾茶(The Boston Tea Party)事件中, 一群美国白人装扮成印第安人登上了“达特茅斯”号、“埃莉诺”号和“海狸”号这三艘装有茶叶的商船, 打倒了英军卫兵, 将茶叶倾倒在波士顿海港中。美国白人之所以要假扮印第安人来策动这起历史事件, 正是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借用其印第安性来创造出革命性与反叛性的民族身份。因为, 随着“英国王室与北美殖民地的冲突激化, 印第安形象开始将美国呈现为脆弱, 被虐待和奴役的”^{[20]30}, 而北美殖民地的白人将自己与印第安人等同起来, 就等于是宣告自己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受害者。他们正是利用印第安人的独特形象创造出一种独立的民族身份, 在独立战争期间来抵抗英国殖民者、谋求民族自立。而对于北美殖民地的白人来说, 印第安性也构成了对其针对印第安人的殖民主义行径的抵抗和消解。就伊斯瓦提而言, 在面对白人文化影响的语境下, 其对印第安性所代表的独特种族身份认同的坚持, 本身就为西姆斯跨种族共同体的身份构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西姆斯所处的时代, 虽然革命战争早已胜利, 美国也已经建立了独立的共和国, 但英国文化却仍在美国占据统治地位。美国“由英裔人群占主导地位的”民族构成, 它的“主导特征是英国的”, “几乎所有的人都讲英语, 英国式的礼仪虽有所改变, 但仍是占主导地位的, 而且英国的自由与冒险精神也激发着全体人民的动力”^{[12]85-86}。所以, 劳伦斯(D. H. Lawrence)认为, 美国面临着身份危机。这个危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 美国没能创造出独立自主的身份; 其次, 它妄想同

时拥有文明的秩序和野性的自由。欧裔美国人代表着逻辑思维和社会秩序, 而印第安人则代表着本能和自由。作为北美大陆的原住民, 印第安人身上体现着这片大陆的精神。白人渴求这种精神, 但他们又无法变得像土著人一样, 从而使自己变得完美。换言之, “美国身份的不确定性就部分地来自于这个国家无力应对印第安人”, “美国人想要跟这片大陆产生天然的联系, 而只有印第安人可以教会他们这种原始的亲密性”^{[20]3}。

解决这个身份危机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对待印第安性。在19世纪, 美国政府的做法是消灭印第安性, 代之以白人文化, 但西姆斯没有将伊斯瓦提刻画为完全被白人同化以致完全放弃自身印第安性的印第安人, 伊斯瓦提身上的印第安性代表了对白人文化的抵抗——这也是其无法被同化的部分。西姆斯对伊斯瓦提的印第安性及其独特价值的呈现表明, 其将之视为丰富其跨种族共同体身份建构的可贵财富。后来的历史表明, 印第安性不仅仅在革命战争年代成为北美殖民地人民可资利用的有力武器, 到了工业化时代, 其更成为美国白人假扮者以抵抗物质主义和工业文明的工具, 帮助其“在城市工业和后工业时代的生活的焦虑中寻求本真”^{[20]7}, 风靡美国的“童子军”运动就是因此而生。可以说, “印第安性为创造性地聚合一个终极的无法聚合的美国身份提供了动力和前提”^{[20]5}。在西姆斯构建的跨种族共同体中, 印第安性作为独立于美国白人, 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性的特殊存在, 不仅可以构成对后者的抵抗, 更可以适当的方式为后者所用, 从而丰富整个国家共同体的身份认同与身份建构。

殷企平指出: “大凡优秀的文学家和批评家, 都有一种‘共同体冲动’, 即憧憬未来的美好社会, 一种超越亲缘和地域的、有机生成的、具有活力和凝聚力的共同体形式。”^{[21]78}作为对于共同体问题高度关注的作家, 西姆斯无疑也具有这种“共同体冲动”, 他常常以其文学作品为载体来体现这种冲动。考虑到他所处的时代, 西姆斯的这种冲动也具备18世纪以后西方作家的那种“时代印记”, 即“群起为遭遇工业化/现代化浪潮冲击而濒于瓦解的传统共同体寻求出路, 并描绘出理想的共同体愿景, 而在其背后, 不乏社会转型所

引起的焦虑,为化解焦虑而谋求对策”^{[21]78}。作为美国南方重农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西姆斯对于北方的工业资本主义一直心存疑虑。在《奇瓦部族的酋长》这部作品中,他将自己对美国社会的焦虑隐含于对历史的呈现之中。他结合维多利亚时代美国主流的男性气概范式来塑造自己理想中的骑士型种植园主,以之作为其设想的跨种族共同体的领导精英。他也以对美国19世纪中期对印第安人实施强制同化行为的批判姿态,刻画出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文化互动和文化适应,作为共同体构建的主要手段。西姆斯对印第安人角色坚守自身印第安性身份认同的呈现表明,他有意将其作为美国跨种族共同体身份构建的宝贵资产加以利用。在这部以美国历史上白人与印第安人战争作为背景的罗曼司当中,西姆斯传递出自己理想的共同体愿景,为处在南北战争前夕、面对前途命运抉择的关键历史阶段的美国描绘出了一幅乌托邦的图景。

参考文献:

- [1] WIMSATT M A. The Major Fiction of William Gilmore Simms: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Literary Form[M].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
- [2] 董小川. 美利坚民族认同问题探究[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1): 51.
- [3] COLLINS K. The Cassique of Kiawah: Simms's Moby-Dick[D]. Russellvill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2002.
- [4] SIMMS W G. The Cassique of Kiawah[M]. New York: Redfield, 1859.
- [5] RUBIN L D. The Edge of the Swamp: A Study in th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of the Old South[M].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6] CUNNINGHAM H. The Language of Patriotism, 1750–1914[J]. History Workshop, 1981(12): 9.
- [7] MAYFIELD J. “The Soul of a Man!” : William Gilmore Simms and the Myths of Southern Manhood[J].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1995, 15(3): 479.
- [8] 曼斯菲尔德. 男性气概[M]. 刘玮,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9: 57.
- [9] CARROLL B. The Religious 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y in Victorian America: The Male Mediumship of John Shoebridge Williams[J]. Religion and American Culture: A Journal of Interpretation, 1997, 7(1): 31.
- [10] COBB J C. Away Down South: A History of Southern Identit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1.
- [11] NAKAMURA M. Visions of Order in William Gilmore Simms: Southern Conservatism and the Other American Romance[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9: 9–11.
- [12] 米尔顿·戈登. 美国生活中的同化[J]. 马戎,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
- [13] TAYLOR W R. Cavalier and Yankee: The Old South and American National Character[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161.
- [14] ELLISON J K. Cato's Tears and the Making of Anglo-American Emotion[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 [15] WEEKS P. Farewell, My Nation: The American Indi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20—1890[M]. Arlington Heights: Harlan Davidson, Inc., 1990.
- [16] GUILDS J. An Early and Strong Sympathy: The Indian Writings of William Gilmore Simms[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Carolina Press, 2003.
- [17] 马岳玲. 论库柏对“文明开化”的批判: 兼谈“皮袜子五部曲”中的文化相对主义[J].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2018, 25(1): 78.
- [18] JENNINGS F. The Invasion of America: Indians, Colonialism, and the Cant of Conquest[M].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 Press, 2010: 13.
- [19] KADAR J. Going Indian: Cultural Appropriation in Recent North American Literature[M]. Valencia: University of Valencia Press, 2012: 112.
- [20] DELORIA P J. Playing Indian[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21] 殷企平. 西方文论关键词: 共同体[J]. 外国文学, 2016(2).

责任编辑: 黄声波